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逻辑

任保平¹, 李培伟²

(1. 南京大学 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63;

2.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从经济维度系统研究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政策逻辑。在历史逻辑方面,逻辑起点是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逻辑脉络是经济现代化下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以整体发展观和人本逻辑遵循重构现代化的新格局。在理论逻辑方面,逻辑框架涵盖“客观必然性—目标导向—发展型式”三个基础维度,即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以工业化为主线的四化协同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与政府治理的制度均衡。在实践逻辑方面,要以整体发展观开拓发展思想的新境界、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替代现代化传统型,同时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生产力质量提升机制、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机制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有效提升机制。在价值逻辑方面,要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判断,同时推动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的共同现代化。在制度逻辑方面,推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结合以及现代化治理体系与现代化的结合。在政策逻辑方面,坚持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运用稳中求进的方法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理论逻辑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10.006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踏上了新的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已经初

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依赖于逻辑、理性和经验研究,而逻辑分为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其基本的逻辑要求是理论结果要与事实存在相符,理论还要来源于正确的逻辑推理过程,在实践成功的基础上,逐步推动理论体系形成。为了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建设,我们需要从经济维度系统研究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政策逻辑。

一、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现代化指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技术和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过程,是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指人类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文化和精神从传统走向先进、其传统社会历经变迁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表明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表明社会在这一文明变化过程中,其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方面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的根本变化,以及社会在城市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是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跨越,逻辑脉络是经济现代化下的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以整体发展观和人本逻辑遵循重构现代化的新格局,发展出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及符合中国道路的现代化观。归纳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有两个基本视角,即从世界进程看中国的“大历史”视角与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看世界进程的“小历史”视角。

(一)世界现代化的一般历史演进与中国的独特道路

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世界范畴,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离不开同世界现代化的时空联系。现代化既发生在先行国家,也存在于落后国家的追赶进程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世界现代化进程以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为推动力,工业化直接表现

为生产技术创新推动规模化生产和生产效率提升,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并首先在整个经济领域导致深刻变化。遍历世界发展的总体历程,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人类社会由农业生产方向工业生产力的转变,正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为此,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始点,以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跃迁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可将世界现代化的总体历程划分为三个标志性阶段,即世界现代化的三次浪潮。

第一次现代化浪潮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英国成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中心。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以煤和铁为物质技术基础、以蒸汽机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工业生产力,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次创新性巨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工业生产力使得人类社会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从对自然力的依附向对自然力的统治的转变。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伴随着普通人严重的失业问题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格兰和威尔士占87%的人只占有国家全部财富的8.5%,而那些财富仅仅是些衣服和简陋的家具。^[4]可见,工业革命所引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存在着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为经济增长代价的路径依赖。同时,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人与物的异化,即人成为机器的“附庸”使得这种经济增长代价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具有高增长、高成本和低效益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态势。

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发生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20世纪初,美国成功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契机,一跃超过英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中心。其主要特征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以电和钢铁为物质技术基础、以内燃机和电动机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新工业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赋能效率远大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

和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工业的领头人。在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开始由以轻工业为主向以重工业为主转变,即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地区已经实现初步工业化。同时,交通运输业的重大突破也使得非西方国家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呈现出从东欧向东亚的扩散趋势,造成传统和现代、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复杂碰撞。在这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和生产的高度集中使得资本主义向着垄断阶段过渡,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为经济增长代价的路径依赖被强化。同时,重工业的集群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加速了资本主义国家朝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环境转折点的逼近,经济增长代价扩展至引发生态、环境和资源成本的整体增加。进一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即工人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间的对立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发展矛盾即旧式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速度落后于新兴国家的发展不平衡矛盾日趋尖锐化,正在成为经济增长代价进一步提高的强化机制。

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得到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以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为物质技术基础、以信息技术赋能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信息生产力,是导致新一次现代化浪潮出现的主要原因。据“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提出者的描述,这是一次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同时催生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5]先行现代化的发达工业国在信息生产力的赋能下开始由初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转型升级,同时,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开始由被动性现代化向主动性现代化转变,积极争取进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这是一次真正全球性变革的大浪潮。^[6]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意识到经济增长高代价所引发的发展不可持续问题,开始由以生产和供给为中心转向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同时注重生态治理的福利体制实践道路。从“数量—质量”范畴

来看,先行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启了从数量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进而推动现代化进程之路。总体上,发达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大致经历了“美国福特主义—自由化”两个阶段,并最终知识中产群体形成乃至主导现代化进程为高质量发展的标志。^[7]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之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

纵观世界现代化三次浪潮的总体历程可以发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核心,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以工业化为前提,工业化对于任何国家只有先后之分,是任何国家现代化都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以初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演进为载体,世界现代化进程所呈现出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演进的一般逻辑本质可以归纳为“经济力量的决定性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8]而这种经济力量又遵循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的逻辑脉络,呈现出“数量型增长—高质量发展”的一般发展趋势。由之,以经济现代化下的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是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但应明确的是,资本主义本性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遵循的现代化观始终服从于“资本逻辑”,即生产力的自然属性始终占据现代化进程的主体地位,环境污染、分配不公以及拜金主义等发展问题只是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下得到适应性缓解而未根本解决。同时,实践表明现代化模式具有多样性,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内部条件、外部环境以及动力机制都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完全遵循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把世界现代化历程解释为,传统社会沿着西方社会现代化模式所发生的单一线性渐进式变化的过程,即现代化不是“西化”或“欧化”,而是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基础上的具有本国国情特点的特色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却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独特现代化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独特道路的不断探索与思想演进

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折射出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体现出中国的民族特色,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即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过程及其发展战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应追溯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通过暴力的方式将工业化输入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持续百年的现代性和传统的激烈碰撞。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具有防御性质的被动性现代化,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统一的新政治体制下的现代化领导核心,由此导致中国的现代化缺乏任何制度性改革的有效支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存在于知识分子的话语中。此时的中国是衰败化、半边缘化和革命化的复杂结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权,由此开始的有计划分阶段推进的工业化和社会改革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国开始走上具有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特征的现代化道路。为此,以1949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起点,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与中国每一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初始条件和禀赋约束相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也可划分为三个标志性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高速工业化赶超发展战略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约束是资本要素的缺乏,表现为农业产值比重过高、人均收入水平过低以及经济剩余较少,即面临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为此,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通过重工业发展战略来促进资本积累,保证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发展,进而通过缓解要素禀赋约束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为中国现代化的起飞阶段积累夯实质物质基础。虽然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赶超发展战略不同于西方发达

国家的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工业化进程,但本质上仍属于数量型增长,具有明显的数量增长特征,即以资本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大来追求生产力水平的大幅跃迁,以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拉动生产效益的提升,动力机制是要素驱动。同时,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的发展仅仅依赖于市场力量难以实现,而这又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载体的工业化进程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需要一套独特的制度体系来提供指导和保障。林毅夫将当时的制度安排总结为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模型。^[9]实践表明,中国政府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推行赶超发展战略所形成的高额储蓄率和高投资比率,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增长得到迅速推进。但高储蓄下的低消费、高投资下的低效益使中国开始进一步探索现代化的新道路。

第二阶段是1979—2011年以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增长时期。重工业化的赶超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低消费低效益的发展后果,本质上是因为这种发展战略违背了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中国要素禀赋所呈现出的劳动力相对丰裕、资本相对稀缺的结构特征,决定了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带动居民消费持续增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即应该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也直接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的逻辑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处于数量型增长范畴,即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扩大物质基础规模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但此时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已经开始和生产力的自然属性相容,即在主要矛盾的逻辑基础上,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两重性相容的促进作用。正如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0]“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11]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直

接体现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其逻辑主线是分阶段实现“温饱—小康—富裕”的现代化进程,将人民切身感受的生活水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参考系和目标导向,充分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最大特色。进一步,保障生产力两重性相容的主要制度创新,促进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强市场和强政府的结合,赋予了其根本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以生产力自然属性为主的“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优势。中国成功崛起的原理在于其市场规模决定了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而市场规模是由国家能力实现的。^[12]

第三阶段是2012年至今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主要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的数量增长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数量型增长在支撑中国经济持续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以至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显现出了生产效率低下、经济结构不协调以及重外需而轻内需的传统增长方式弊端。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人口红利消退、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以及技术模仿赋能下降的强约束合力使得依靠规模报酬递增的路径依赖难以为继,同时由其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低端化低质化特征,供给侧无法满足消费者对商品更高质量的合意性,形成需求结构变化和有效供给不足、中低端供给过多和高端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13]因此,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转向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提出的逻辑基础是传统的数量型增长无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本质上是人民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和标准,但现有商品因无法充分满足人民需求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出现失衡。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政策,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线以培育供

给侧新动能,通过提高生产质量来满足人民对产品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合意性。同时以供给侧新动能重振需求侧动能,即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新增长点。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而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14]新发展理念规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以质量效益递增为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通过经济规模的质量型扩张追求效率增长来拉动质量增长,动力机制是创新驱动,根本保障是制度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演进的一般趋势呈现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不断统一。民族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充分把握和认识,逐渐形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逻辑基点、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逻辑主线、以人民为中心为逻辑主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逻辑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独特道路。世界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的准确把握和遵循,不断总结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保持理论的先进性、现代性和世界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不断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归纳为: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以经济现代化建设为主线向社会、政治、生态等多维度拓展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是以整体发展观为基本遵循,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来推动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赋能经济现代化,而经济现代化服从于“人本逻辑”的现代化观,并将其作为生产力两重性相容的逻辑基础,从而由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民族性和世界性不断统一的“衔接者”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为经济现代化所服从的“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中国式超越。人本逻辑以人的现代化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和终极价值判断,不仅注重生产力数量和质量、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相容性发展,更注重生产关系中公平正义的形

成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体现的是党对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价值承诺以及党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取向,由此引致出一系列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规范,为此,“人本逻辑”的本质是“生产力逻辑”和“价值逻辑”的有机结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二、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统一于历史逻辑,是对历史逻辑本质的深层次反映和理解。^[15]从数量型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有其客观必然性,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规律遵循以及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指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和发展进程。^[16]那么,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就必然会涉及目标导向和发展型式两个维度的理论问题。因此,理论逻辑框架涵盖“客观必然性—目标导向—发展型式”三个基础维度,其逻辑本质是对现代化一般理论的守正与创新。

(一)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表明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不在于总量矛盾,而在于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的本质是质量矛盾,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导致的发展质量落后于人民的实际需要而出现的总需求总供给的结构性矛盾。转向高质量发展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在初级发展阶段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发展目标、发展任务的要求,以数量型增长推动生产力数量提升来解决贫困问题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而进入高级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目标就要转向实现现代化。^[17]实现经济现代化要求在数量和质量统一中更加注重生产力质量的提升,即以高质量发展模式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进一步,我国已经步入中

等收入国家行列,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风险,同时,我国数量型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外需拉动,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代价是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因此,通过高质量发展打造质量效益递增型经济体必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优解。

(二) 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

目标导向是发展阶段性和发展规律性的统一。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目标导向的布局逻辑是将追赶发达国家作为当前主要目标,通过高质量发展分阶段推进经济现代化,赋能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依此决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进而明确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路径与政策。发展阶段性体现在从提出“三步走”的现代化进程,到适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两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发展规律性体现在对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客观认识的基础上,以被追赶国家所达到的现时经济现代化水平为参照,以中国基本国情为初始条件,遵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适时调整发展阶段性的实现时间、具体路径和发展目标。目标导向还有一个目标具体性的问题,即确定追赶指标,由此来找到与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主要涉及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率、人均预期寿命等社会发展指标。

(三) 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

高质量发展是由高质量生产力决定和推动的。^[18]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就需要培育高质量生产力,以生产力质量的提升来推进经济现代化。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逻辑指在生产力数量稳步提升的基础上,以生产力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来促进生产力两重性的充分相容和发展。生产力数量由发展规模决定,动力机制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生产力质量由生产力要素的质量、生产力要素的协作质量和成果产品质量共同决定,动力机制是创新驱动。创新驱动

的本质是提升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创新驱动机制的形成要求以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数据资本为关键要素,同时考虑制度创新参数,通过制度体系优化来推动三大关键要素协作能力的提升,进而实现效率变革,即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和体制机制效率的协同提升。效率变革的目标导向是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进而培育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即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

(四)以工业化为主线的四化协同推进

如上文所述,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以工业化为前提。同时,处于价值链核心的制造业,具有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驱动作用,其技术外部性优势又会推动农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化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为此,以工业化为主线是经济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已经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建成完善的工业体系,所以工业化将转向工业现代化,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包括合理化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业基础、现代化的产业链条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能力是一国经济现代化水准的度量标准,也是一国国家竞争力的衡量指标。因此,以工业化为主线的目标导向是产业竞争力的可持续提升。以工业化为主线,“并联式”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和伟大创新,其摒弃了先行现代化国家“串联式”的发展路径,以平衡全面的发展战略、质量型的发展模式高度压缩现代化进程,避免木桶效应和现代化后遗症的出现,同时是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并联式”发展的逻辑内核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转变,避免在物质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带来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精神危机,并进一步演变为社会矛盾与冲突。

(五)市场经济与政府治理的制度均衡

实践表明,任何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均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制度变迁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同时,大多数经济增长的成功案例都涉及高度的政府干预。^[19]市场失灵的存在表明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问题,这就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进一步,市场不可能使任何一种低效率资源投入持久化,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所遵循的效率最大化原则与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协调发展策略存在矛盾,仅仅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后果往往是区域、城乡、行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扩大。同时,市场调节也有其问题:一是没有宏观调控能力,存在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二是这种调节是以部分生产力破坏和损失为增长代价的事后调节,影响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本质是市场经济驱动和政府治理保障的制度均衡。市场经济驱动要求价值规律在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根本性作用,突出市场的自主性。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有效市场的价值观念是根植于儒家文化的集体主义下的社会理性,其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利己主义下的个人理性。社会理性的价值观念以“德治”“人治”和“民本”为出发点,在竞争中注重个人利益增长的同时兼顾社会利益,注重效率效益增长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追求在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推进共同富裕,是一种“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的价值体现。政府治理保障既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又要防止政府失败,存在着一个政府边界性的问题。一是资源配置边界,市场配置资源遵循效率原则,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公共资源配置遵循公平原则,需要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政府干预边界,包括干预范围有限和干预手段有限两个维度,范围有限指凡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政府应及时退出,避免政府管制排斥市场作用的出现;手段有限指政府监管和政府调控的科学性,应该明确市场作用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避免政府寻租、腐败和官僚主义行为的出现。

三、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现实反映,是当下的实践、发展了的实践。^[20]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框架,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一)以整体发展观开拓发展思想的新境界

意识形态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体系,通过观念体系重塑推动国家意识形态的变革以形成长期结构性发展。^[21]在新时代下,这种观念体系重塑表现为以整体发展观开拓发展思想的新境界。整体发展观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概括起来,一是中国的大国国情,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三是进入新时代的具有时代性特征的目标导向。由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成为整体发展观形成的逻辑基础。物质文明强调发展方式必须由数量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遵循新发展理念,摆脱高投资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政治文明强调制度文明和政治观念文明,在制度文明层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治观念文明层面,发展政治价值观,推动政治信念和政治情感的进步。精神文明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中的人本逻辑。社会文明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体系,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理念的中国式突破和创新。

(二)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替代现代化传统型

现代化传统型既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也指中国长期以来采取的高投资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用社会主义现代性替代传统型是中

国式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现代性指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下,遵循人的现代性最大化的“人本逻辑”,具体包括:一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着力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二是以人的现代性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经济现代化不能见“物”不见“人”,见“物”属于“资本逻辑”,所带来的是一系列发展恶果,而见“人”属于“人本逻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效结合。人的现代性最大化的目标导向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括人自身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方式达到现代化两个方面。^[22]三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客观规律,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3]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然并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通过意识主导、制度支撑、系统推进和全面实现四个阶段来发展绿色生产力。四是协同推进共同富裕与经济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大特征,也是人本逻辑下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即通过“人的发展—物的发展—人的发展”的螺旋式上升,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实现。

(三)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生产力质量提升机制

生产力质量由生产力要素的质量、生产力要素的协作质量和成果产品质量共同决定。生产力要素不同于生产要素,而是涵盖劳动、劳动对象、生产的组织与管理以及科学技术等多要素的集合。生产力要素集合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而不断自我进化。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以数字化创新为内涵,以数字经济为发展形态的现代科技要素将成为决定生产力质量的关键生产力要素,所形成的数字生产力将成为生产力质量提升的新增长点。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生产力质量提升机制是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有机衔接的关键环节,构建原则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体现在:一是要素融

合,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其本身不会直接创造价值,而是以传统生产要素和现代生产要素为载体发挥作用,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本、劳动力和知识的要素质量,提高投入产出比,另一方面重新组合传统生产要素,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二是产业融合,既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也包括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新产业,融合趋势是数字信息技术下的产业交叉、渗透和重组,其所产生的新增长效应将会加快现代产业体系的建成。三是基础设施融合,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和升级,将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相融合,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支撑体系构建的关键。四是人才融合,科技人才既包括大学或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也包括科技企业家,科技企业家缺乏是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效应不够明显的主要原因。科技企业家来源于科研人员实践化或企业家知识化,前者存在较大的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后者则可以直接给融合效应带来倍增作用。培育科技企业家的主观约束是企业家的数字化转型意识和发展战略变革思维的欠缺,客观约束是教育现代化改革不到位和合适的制度体系安排不足。

(四) 构建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机制

以经济结构升级解决结构性矛盾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而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基本路径进一步要求通过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构建是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根基,“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24]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国内经济发展实现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在结构上更高质量维度的均衡,其路径在于: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具有更高维度工业化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从产业结构多元化向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转型。二是构建新型消费体系以激发潜在消费能力,新型消费体系以新兴消费、精神消费和个性化消费为消费提质扩容的新增长点,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三是形成产业

结构和消费结构协同升级过程中的互动机制,即以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品质量,使其使用价值合意于消费者的质量要求,促进产品价值实现。同时,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品和服务创新,通过供给创新提升生产力质量,推动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四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互动机制相结合,一方面推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区域、城乡和行业的协调发展。构建起两条发展路径以创造和开发更大容量、更多层级和更高质量的大市场,尽可能延伸国内大循环的发展覆盖面。发展覆盖面越大,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效能越大。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是使发展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的重要举措。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采取更加合理更高质量的开放方式,不仅包括商品、生产要素、服务的简单国际流动,还更加注重国际产业布局合作下的价值链分工和聚合的重构。^[25]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通过国内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以建立更加全面的开放布局是目标导向,但同时也应将增强产业链自主控制力、避免产业链“断链”风险对国内大循环的冲击作为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安全准则。

(五) 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机制

社会主义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2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27]经济现代化进程不仅是生产力进步的过程,也是治理现代化的过程。维持和巩固市场经济驱动与政府治理保障的制度均衡需要以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机制为前提与保障,是外源型现代化进程的构成要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要求在制度现代化中建立起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的制度均衡格局,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互补性合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治理效益共同最大化下的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治理目标具有目标导向属性,必然服从于发展阶段

性和发展规律性的统一。治理模式是“政府—市场—社会”治理主体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充分发挥政府规制、市场机制和社会参与的协同作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可能会同时存在,从而使现代化进程失控,处于无序状态,^[28]此时,社会参与就成了“第三只手”。在制度、道德和文化的约束与激励下,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三主体,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发挥互补作用和长尾效应。治理动能是“技术有效—制度完善—组织合理”的有机结合。技术有效的一体两面是“硬技术”和“软技术”的衔接,“硬”的层面指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化治理,“软”的层面包含了通过政策制定、文化的道德约束等方式改进治理效能的技术,防止“硬技术”的异化。^[29]制度完善一方面应完善正式制度,保障治理秩序、降低治理不确定性以及形成治理激励结构;另一方面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发展,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经济人”“道德人”和“文化人”的统一。组织合理指政府内部、各级政府间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组织变革,既包括纵向维度的层级数量减少,也包括横向维度的部门壁垒消散,即通过网格化的组织结构发展来降低治理体系的内部成本和信息不对称。这方面的机制建设还应注重对治理效能及时客观的事中事后评价,即构建可操作、可测量及客观中立的具体指标体系、政绩体系、统计体系等。

四、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价值逻辑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所遵循的“人本逻辑”是“生产力逻辑”和“价值逻辑”的有机结合,既要求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又要求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从自然性出发,只要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发展就会始终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就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这就需要一定的价值规范为自然欲望“立法”,以精神财富的增加来使人

类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形成自我节制,使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才可能使社会主要矛盾得以解决,使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即“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得以成立和实现。

(一)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

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0]市民社会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来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认为人是抽象的、生物学上的只具有“自然属性”的人,“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31]在市民社会的视域下,社会成员是独立的个体,其合目的的行为表现为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社会成员关系依靠满足彼此需求或欲望为纽带所形成。整个市民社会就是一场露骨的、追逐盈利的“普遍运动”。^[32]由于将社会成员看作具有“自然属性”的人,自然属性的先天不同导致了社会成员内部的后天分化,从而逐渐在市民社会中孕育出“等级结构”,直至演变为不同阶级。市民社会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和等级结构的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立足点,也是“资本逻辑”的立足点。资本自由和人的个性自由成为市民社会现代性建构中的“二律背反”,实质上是见“物”不见“人”的具有资产阶级剥削性特征的社会关系的现实表现。“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建中形成的。马克思从主体的或实践的形式来考察人,认为人是由实践生成的具有社会性或社会化的人,社会成员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在社会实践中生成的人,具有“自然属性”的同时兼有“社会属性”,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兼顾个人价值和共同体价值的统一,是“人本逻辑”的立足点,也符合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特征,这直接表明人类社会的最终奋斗目标不是突出少数人或为少数人谋取利益,而是解

放全人类。因此,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存在两层意蕴: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规范,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价值判断;二是“共同现代化”的价值体现,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追求和实现共同体价值最大化,其当代价值的重要体现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

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市民社会”指资产阶级社会,“人类社会”则指共产主义社会。^[33]为此,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的价值逻辑必然要求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本质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规范,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代后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定位。映射在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上,体现为人民生活实现“温饱—小康—富裕—幸福安康”的价值目标,逻辑内核是社会主义现代性最大化的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特有目标,是对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的中国式体现。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过程,也是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过程,而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增长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积淀、吸收和创新,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发展规律性和发展阶段性的统一,一方面会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进程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创新,正如“美好”被加入价值目标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充分认识的结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人类社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基本遵循,是发展规律性和民族性特征的根本体现。

(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推进经济现代化,必然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现代化目标及价值

判断。“共同”是共享发展理念的体现,属于公平正义问题;“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体现,属于效率效益问题。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发展,只有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才能推动生产力两重性相容,推进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否则结果只能是共同贫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是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缩小,现实价值判断是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显著提升并覆盖大多数人。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表明低收入群体的减少,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得以提升,进而使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成为可能。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机制运行的根本动能。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关键在于基础性分配制度的合理安排,形成一次分配重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重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重自愿重道德的收入分配关系。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难点在农村,2022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比达到34.7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45,^[34]解决“三农”现代化问题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让农民富裕,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本来自对传统农业发展型式的改革,即注重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产品流通完全、农民人力资本提升、土地价值流转改革和现代生产力要素引入的协同发展。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判断,应超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兼重精神财富以及生态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以人的现代化为价值目标表明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是人在全面发展过程中获得能力的机会均等,直接表现为人民对现代化进程的评价,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终极价值判断。

(四)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的共同现代化

以市民社会为立足点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国强必霸”特征,这是在“资本逻辑”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无限贪婪追求的结果。自由市场资本化全球化又使得市民社会的“等级结构”特征嵌入了“世界市场”的范围内。^[35]显然,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过程表面上是打着平等互惠的意识形态叙事招牌,却使不同经

济主体之间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呈现出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工业文明剥削农业文明和西方剥削东方的全球化特征。目前全世界已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均是资本主义经济体。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的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规定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即以全世界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以共同体价值最大化为基本目标,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共同现代化。共同体价值不仅秉持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关系,更是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关系纳入价值规范,是中国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自主探索和伟大创新。共同现代化特征表现在:一是强调不同国家之间现代化的协调,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现代化;二是强调在尊重各国差异化发展的基础上以共同利益优先;三是强调各国合作,坚持合作共赢的现代化原则;四是强调世界各国的整体现代化,任何国家都有实现现代化的机会和可能;五是以数字经济为背景,通过数字技术使全球形成分布式神经网络,让各国的联系与合作得到显著加强。^[36]

五、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制度逻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37]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有效提升机制的过程本质上是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根据诺思的研究,工业革命的产生前提是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推动了技术进步,进而引发了工业革命。^[38]为此,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需要制度创新先行,以制度创新为现代化前提,以制度体系完善为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根本保障。

(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是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和现代经济发展必要条件在中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虽然起源于本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且随后诞生了民族资本

主义,但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在中国成功实现制度变迁,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政府缺少必要的组织手段来整合社会资源和应对外部冲击。中国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力量所采取的效仿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方案也因为没有有效的制度支撑而付诸东流。在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苏联成功的社会主义经验,使得中国的先进人士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认识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伊始便一直坚持着用社会主义拯救中国、发展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建立,再到“四个现代化”的提出,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紧密贴合在一起,这是独特的历史规定性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即经济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而现代化以经济现代化为前提,经济现代化以工业化为主线,工业化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大幅增长,是经济力量的可持续提升,可见,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基础具有天然同源性。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所建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现代化新的理解和内涵,经济现代化层面具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及价值逻辑等。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的具体化中国化,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创新,创新的根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遵循。以社会主义赋予现代化观新的内涵,以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是制度逻辑的基本规律。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逻辑本质是市场经济驱动和政府治理保障的制度均衡。以有效市场着力解决现代化的效率问题,以有为政府着力解决现代化的协调共享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结合的根本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结合的中国式制度特色是横向经济维度与纵向政治文化

维度的交叉结合。横向经济维度指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下来理解有效市场。从市场本身来看,有效市场指价值规律在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根本性作用,突出市场自主性;从所有制形式来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有效市场的制度属性是社会主义,依靠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的优势地位和主体作用来引导现代化进程向目标导向趋近,尤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即彼此的竞争与合作是有效市场的客观要求;从分配制度来看,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将个人劳动收入与所付出的劳动量相联系,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与有效市场的本质特征相契合,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勤劳致富,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同时完善要素报酬机制旨在充分调动要素主体的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潜力。可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有效市场自主性和制度优势体现的基础。纵向政治维度指有效市场只有以政府治理现代化为保障,完善市场秩序和市场监管,建设现代产权制度,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价值规律才能发挥根本性作用,要素市场化配置才能自由规范。纵向文化维度即价值观念是社会理性的体现,具体可见上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结合的基础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完善,依靠现代产权制度规范产权归属、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和产权安全,形成持久稳定的制度激励,可以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现代产权制度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和产权制度的结合,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权力的配置与组合,符合制度逻辑的基本规律。^[39]

(三) 现代化治理体系与现代化的结合

治理现代化能力是现代化治理体系与现代化结合的制度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现代化概念从经济现代化衍生至治理现代化。两者结合的前提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包括政府组织现代化和制度体系现代化两方面。政府组织现代化意味着政府组织结构向扁平化网络化民主化发展,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原则的

根本要求。一方面,过多的政府层级结构会造成行政信息和社会信息流通的传播扭曲效应更加突出,存在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并联式”现代化需要各级政府的通力协作和及时协调,过多的政府层级结构会使得信息滞后和信息不对称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阻碍。政府组织现代化下的管理层级减少的直接结果是管理幅度的增加,这就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和对政府职权配置的优化,即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现代化要求;还需要技术赋能,依靠数字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府组织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制度体系现代化既是政府组织现代化的结果,也是政府组织现代化的约束,更是现代化治理体系与现代化结合的关键。现有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以物质资本产权为基础建构的,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创新驱动决定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成为主导资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衔接以及创新链的形成成为制度体系现代化的新基础。制度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应是坚持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作为基本遵循,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为制度变迁动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形成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制度保障的路径依赖:一方面使制度效能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可以赋能于技术变迁,进而推动经济现代化;另一方面使政府良政善治和治理现代化能力可以通过制度效能得以充分体现,协调好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最大化公共利益为基本目标,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和治理评价提供制度保障。

六、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政策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良好制度”和“良好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制度效能和政策效能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化的治理效能。制度是治理基础,而政策是制度的运行方向和实质内容,是治理的具体体现。政策和制度的结合也是现代化目标

导向的根本保障。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在制度逻辑背景下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政策逻辑。

(一)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

发展规划作为一种战略性、前瞻性、导向性的公共政策,是我国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履行经济社会管理职责的重要依据。^[40]国家发展计划强调政府主导,而国家发展规划强调市场主导,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的给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一套特定的量化目标,并采用发展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本质是具有指导性的国家发展指南。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在资源配置中的指导作用是实现市场经济和政府治理制度均衡的关键要素。发展规划旨在通过规范市场秩序、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使市场自主性得以充分发挥,通过引导公共资源配置、平衡利益主体关系防止市场失灵,避免出现生产大量过剩和贫富分化加剧的发展问题。从这个维度来看,发展规划具有介于自由市场与集中控制两种极端情形之间的折中特性,既防止市场失灵,也避免政府失败。国家发展规划的趋势是形成更加全面长远的系统谋划,从经济领域延伸至社会、环境、文化等多个重要领域,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经济和社会利益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三维协同。作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理论落后于实践是我国发展规划长期存在的最大问题,其结果往往是规划对有利于未来发展的信息吸收受限,各级发展规划之间自洽性较低。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加强规划评估的基础理论研究,借鉴和吸纳先进规划评估技术,并建构“过程—结果”“效益—问题”及“客观—专业”的全周期规划评估形式,通过发展实践优化理论研究、通过理论研究指导发展规划应成为国家发展规划建设的基本遵循。应明确的是,国家发展规划的有效性同时是建立在政府组织现代化和制度体系现代化之上的。政府边界性决定了国家发展规划应更加注重成为公共资源配置、提供公

共产品的指南和依据,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承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决定了国家发展规划应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用,将人民的切实需求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将人民的评价和意见作为国家发展规划的重要评估依据。

(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供给体系 and 需求体系在结构上更高质量维度均衡以解决结构性矛盾的政策前提。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需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结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战役性改革、重点领域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的协同发展。在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上,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赋能加快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一是在微观层面培育科技企业家,激发企业家创新活力。科技企业家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新的生产力要素,这一命题源于:传统的企业家精神无法充分解决受到摩尔定律、梅特卡夫定律和达维多定律三大定律支配的数字经济所导致市场发展方向不确定性递增的经济问题。而科技企业具有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数据资本相结合的新企业家精神,当某个市场规模扩张或出现新需求时,科技企业家能比传统企业家更快响应这种需求,整合资源将创新方向转向这一市场或新需求,即具备了市场导向下的定向创新能力。科技企业家来源于科研人员实践化或企业家知识化,企业家知识化在制度体系完善的前提下是科技企业家的主要来源。二是在中观层面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现代产业体系需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关系。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是新型工业化的前提,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是新型工业化的主线,是我国超越发达国家的關鍵。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为前提,但我国产业基础尚不具备系统性整体性的发展支撑能力以及受到产业链断链、技术断供等国际威胁,这些均需要政府发挥新型举

国体制优势,通过国家发展规划和创新宏观调控来系统谋划、总体布局和统筹推进。三是在宏观层面通过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来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促进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以整体发展的质量提升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重解决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体制机制效率的长期变革问题。

(三)以稳中求进为方法论创新宏观调控

数量型增长时期的总量矛盾属于短期矛盾,可以运用短期逆周期总量调控有效解决;而高质量发展时期的结构性矛盾属于长期矛盾,同时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增速换挡、结构转型和动力转换的新特征,这就要求政府以稳中求进为方法论创新宏观调控。这一方法论要求将短期调控和长期调控相结合以实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相统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相统一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的本质要求;从经济基础维度来看,低端供给过多和中高端供给不足、需求结构变化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我国必须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管理”的长短期政策组合,以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现代化进程。从社会主义制度维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目标必然决定中国共产党要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统筹谋划才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符,与以“人本逻辑”为基础的人的现代化过程相适应。为此,新时代需要将宏观调控体系置于系统逻辑中进行整体性长期性考虑。以稳中求进为方法论创新宏观调控要求:一是坚持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国家发展规划本质上属于政府进行的长期和超长期的宏观调控,是党中央对未来五年发展重点、发展方向以及发展方式的具体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系统谋划和总体布局,具有以长期发展效益为主兼顾短期发展效益的特征,为此,应将创新宏观调控的基本方向与国家发展规划有机衔接,以国家发展规划为基本导向创新和完善调控举措。二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形成。^[41]以“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锚定“短期稳定、长期

增长、结构转型”三重目标,建构“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三策合一框架,实现在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短期经济更加稳定、长期增长更加可持续性的总体目标。需要说明的是,这三重目标中的任意一类均有成为核心目标的可能性。创新宏观调控政策应突出核心目标决定性作用,兼顾核心目标对其他两类目标的消极影响,前瞻性地考虑政策组合影响和潜在矛盾。三策合一有利于简化政策目标、突出调控重点,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的宏观维度统筹谋划和创新完善宏观调控举措。三是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形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42]由宏观政策组合向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转变就是要发挥制度的基础性、整体性和长期性作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根本优势,解决政策组合的固有问题和潜在矛盾。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本质上是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宏观调控相结合,赋予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制度属性,表明创新宏观调控的新趋势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式现代化+宏观调控”的结合。同时,将宏观调控从经济范畴上升和内化为国家制度范畴,一方面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导向相契合,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宏观调控中的系统优势,从本质上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注释: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

[2]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4]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 第三卷 工业革命》,吴良健、刘汉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91-92页。

[5] [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孙

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4页。

[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

[7]高培勇、袁富华、胡怀国、刘霞辉:《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治理》,《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4页。

[9]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聚焦新时代的关键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4-79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12]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5页。

[13]任保平、李培伟:《数字经济培育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机制与路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4][16]洪银兴:《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经济学家》2022年第11期。

[15][20]张雷声:《关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思考——兼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17]洪银兴:《以创新的经济发理论阐释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18]任保平:《从经济增长质量到高质量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14-215页。

[19][美]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本书翻译组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296页。

[21]任保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高质量发展逻辑》,《学术月刊》2023年第1期。

[22]洪银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与现代化》2021年第6期。

[23][30][31][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502、530、316页。

[24]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求是》2023年第8期。

[25]任保平、朱晓萌:《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开放的测度及其路径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20年第9期。

[26][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27]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9页。

[28]曹沛霖:《制度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5-176页。

[29]刘铮:《“硬技术”与“软技术”:论米歇尔·福柯的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5期。

[33]黄学胜、易江:《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世界观念变革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两种社会观》,《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34]《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8/content_5743623.htm。

[35]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36]任保平:《共同现代化: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37]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38][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3-234页。

[39]白暴力:《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的过渡——现代西方社会中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潜在表现形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8期。

[40]杨永恒:《发展规划定位的理论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8期。

[41]陈彦斌、刘哲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应对“三重压力”》,《财经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

[4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责任编辑:刘毅〕